

悲劇時代英雄：

神秘人物張冲(二)

●朱開來

(本文插圖刊第6頁)

前往延安見毛澤東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底，張冲奉派飛往延安考察，並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談。

茲根據總統府機要檔案將張冲與周恩來、毛澤東談話概要錄次：

(1) 與周恩來談話概要

一、共產黨政策轉變之真因：在江西被封鎖時代，對外間情況不明，而且為不斷的軍事行動所刺激，故缺乏考慮，而往前直幹。自離開江西後，接觸人物漸多，對於中國社會之實況，亦比較有廣泛之接觸；尤以通過川康邊境時，目睹落後之社會與困頓之環境，遂對過去鬥爭之方法漸生懷疑之觀念。特別是紅軍進入西北期間，適值日本進攻華北正亟之時，紅軍一般士氣，對外情緒高過對內情緒。爰於二十四年下半年起完全決定放棄農村中階級鬥爭之土地革命，而求對內民主政治之實現，與對外民族解放運動之展開。

二、共產黨政策轉變之過程：抗日的民族革命方針，代替了土地革命政策之後，共產黨對於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先生仍持絕對反對的態度；而

以「反蔣抗日」為一切活動之中心。其後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會見，張對蔣氏之抗日態度與抗日準備，言之甚詳，使周深受感動，曾與共黨高級幹部再三討論，嗣並決定「逼蔣抗日」方針。迨二十五年秋季以後，紅軍與外間之接觸益多，同時華北情勢亦日緊，特別是綏遠方面情勢萬分緊張，共黨乃進而提出「聯蔣抗日」，甚至「擁蔣抗日」之口號。西安事變中，共黨更以堅決的和平態度，表示其對於所提政治主張之誠意；故最初力主送蔣離陝，繼又力主撤兵，希望在此種行動中，求得蔣氏之諒解。

三、共產黨目前的政治要求：甲、初步辦法（即向三中全会建議者）○黨的活動，須事實上允許其公開，在一種各黨共同政治綱領之下從事工作。○政治上暫時保持蘇區原有地區，惟名稱可以改變，內部組織可以逐漸接受中央法令。○紅軍在名稱軍令與編制上，可以聽中央之規定，但軍隊幹部與原有系統，不能改變。紅軍大學可以停辦；政治委員可以由中央派遣。事實上是一「聯軍」的形式。乙、理想的辦法○各黨在國民會議中活動。○國民政府之產生決於國民會議。

軍隊「國防軍化」。

四、理論問題：此為民族統一戰線，其精義為「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對內在求和平方法下的統一，對外在求團結一致努力禦侮。中國非獨立的國家，非帝國主義，不能有侵略國外弱小民族的統治者，故非法西斯的統治。因此，人民陣線，沒有對象，祇是無的放矢。同時因中國目前為危急的半殖民地國家，不容許長期的國內對立，因此，不能學西班牙，同時不够做西班牙。

(2) 與毛澤東談話概要（毛澤東所談與周恩來頗多相同茲僅擇錄其不同之處）

一、暫時聯軍相互間信用擔保問題：紅軍在統一編制與軍令之下，隨時可以用服從命令的事實來證明其信用。

二、立即抗日問題：共產黨也主張準備後抗日，但必須在對內和平統一的前提下。過早對外戰爭，是大局的損失。目前最多不過立即接綏，如果綏遠方面情勢緊急的話。

三、單方面的投降問題：如中央要強迫共產黨單方面投降，則祇有戰爭，現在共產黨也已經預備這一着。在他看來，政府如要強迫共產黨投

降，便是不誠心走和平統一的路，那末就是有戰爭，其責任也不在共產黨了。

四、第三國際問題：第三國際的政策，近已注意各國共黨的民族性與地方性，這點沒有多大問題。

五、羣衆運動問題：和平統一如能進展，則目前可以停止農村工廠及學校中的鬥爭，把對內的目光轉到對外上去。

與史達林作半日談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政府組織蘇俄實業考察團，實際是在接洽軍援。楊杰（耿光）擔任團長，張冲擔任副團長。

張冲在未赴俄以前，曾於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話，轉達蔣委員長對於「托派問題、動員問題、軍備問題」之意見。茲據總統府機要檔案張冲與鮑大使談話經過的報告錄次：

「職奉 鈞命於九月十八號與俄大使商談前次該大使所提各事，茲將談話經過繕成書面報告，經鄂山蔭秘書核正無誤，敬呈 閱。職張冲敬呈。九月廿日。

A 貴使前向委員長面述下列各事：「托派問題、動員問題、軍備問題」，因目下戰事急迫，委員長特遣敝人前來轉達：

(一) 托派問題

A 中國政府過去對托派極其注意，如張慕陶等被逮捕，王公度之伏法，陳獨秀等之不能發表言論，皆係事實，如貴使方面有關托派活動之消

息，亦祈見告，隨時注意予以取締。

B 此事殊為快慰，本大使請貴方注意，並不因為他們僅係蘇聯敵人，吾們敵人，吾們自己消滅了他，問題在消滅中國敵人之工作，因為現在已經證明他們係日本參謀本部代表，所以亦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直接敵人，張慕陶被捕，陳獨秀停止發表言論，這當然很恰當，但仍須徹底對付他們。同時此種份子非嚴密偵察，不易發覺，最可注意者，托派之所採步驟，第一步作各種宣傳，一旦時局嚴重，則各種暗殺破壞工作手段，亦幹出來，其施之貴國重要工作人員，一如對付高爾基、貴比謝夫等，應請委員長注意。

(二) 動員問題

A 中國過去曾有種種動員計劃與努力，如過去第六部及現在政治部，皆有專人負責，但未能收效，或因民運工作、社會工作人員，不知此種工作之技術，可否請貴國方面派社會方面或政治顧問數人前來協助？至過去國內各黨派各自動員，與中央缺少聯絡，步驟凌亂，以致磨擦者有之，共黨方面竟提議與國民黨合組共同委員會，指導動員，不知貴使有何意見？

B 貴國羣衆運動人材不少，對派遣政治顧問一層有無引起英、美疑慮，亦應注意。中國如要採用蘇聯經驗，本大使可以隨時貢獻，或隨時電詢莫斯科的意見。但委座確要顧問，敝使可電莫斯科請示。關於動員，敝使個人意見，軍委會六部及政治部無成績之原因，不在他們不知技術，而在他們未努力去作，同時覺得貴國方面，還有害怕發展羣衆運動現象，本使意見，祇要引導社

會各界共同辦理此事，即有成效。至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合組一個委員會，這當然是中國內部事情，不過本使覺得如共黨與國民黨合組委員會，最易引起中國赤化了之謠，實不方便。把此事交給各方參加之國民參政會比較合當，為指揮方便起見，國民參政會可以組織一個動員委員會，指揮這個工作。

(三) 軍備

A 貴使前謂戰事應分為兩個階段：(一)為消耗戰；(二)反攻。此二階段之界限，極不易分，惟目前應多建立預備軍為反攻之用，又應多開機場及計劃陸、空作戰。此層關於徵募士兵，以中國人口之多不致困難，惟槍械重兵器缺乏，又飛機來源亦屬不易，所以對新立之軍隊武器與飛機，貴國是否能供給？

B 是的，根本問題要馬上着手編制突擊軍，因為此，應該：①馬上開始建造飛機降落場、公路、運輸交通等等。②物質方面，要馬上計算物質方面各種武器要用多少，並應計算武器之來源，這就是中國國內可湊多少，國外如蘇聯等應買多少，從速計算，以便提出，在青黃不接之時，現有部隊武器可移動使用。

(四) 日本防共聲明

A 日本外務省及近衛聲明，謂根據防共協定，一旦戰事爆發，將援助德、意有所動作，貴使有何感想，是否有與敝國當局交換意見之必要？

B 本人很願與委員長詳談，但限於時間，如委座見召，當即前來。」

俄大使鮑格莫洛夫對於中國抗日戰事觀察錯

誤，後來被調回國，改由潘友新繼任。

據蘇俄伏羅希洛夫元帥後來對張冲透露，要更換鮑大使的原因，是其迭次報告均觀察錯誤。如第一，上海戰事一起，中國即遭失敗。第二，中國戰爭之準備相差甚遠。第三，蔣委員長無徹底抗日的決心。第四，中國內部若遇戰爭，不能統一等。

張冲等於十一月初到了莫斯科以後，於十一月十二日晉見史達林，商談關於助我自製武器、飛機及請蘇俄參戰等問題，此次會談長達四小時三十分鐘，實為中俄外交史上的空前紀錄。據聞過去我國某駐俄大使終其任期，尚有未與史達林謀面者。茲將張冲與史達林談話詳細內容，簽呈蔣委員長的報告錄次：

「委座鈞鑒：謹將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七時半至十二時，互四時半，與史達林先生談話內容摘呈：

(一)史達林先生云：1.中國要作戰保全領土，非建設重工業及軍需工業不可，否則國家常在飄搖之中。2.現代軍隊非有重砲及重兵器不能作戰，舶來之品質既不良又不可靠，予願幫助中國在抗戰中建設工場一個，能製野戰用各種口徑之砲，直到能出十五生的五之重砲。3.飛機由外供給，既不經濟又不能如期辦到，此次蘇聯飛機飛到中國途中，已有二十餘架失事，因氣候惡劣，五十公里以外不能見物，在高速度之兵器自然要遭意外。中國所缺者為飛機發動機，此後予承認無限的供給中國，但其餘機體均可派專家到中國製造，每月能出五十架，再加以擴充，即可每月增至

三百架。飛機在作戰期間，三四個月即須更換，故機體不必用輕金屬，用木製亦良，因其效用相同而經濟也。4.無汽油亦不能作現代之作戰，陝、川、新均有油礦，蘇聯可代為組織，數月之後即有滿足中國之望也。

(二)史達林先生鄭重答覆職請蘇聯參戰之談話

1.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其理由：甲、日本現在打中國是軍閥之主張，財閥如三井、三菱等贊成之，但一般商業階級、農民皆不願意，因彼人民等認日軍閥壓迫中國，愈陷兩民族於仇深似海也。乙、若蘇聯向日本開戰，日人民必以為蘇聯亦係分潤中國之利益者，刺戟日本國民之反抗，激成日全國民之動員，結果反助日本之團結，故蘇聯對日本之開戰等待時機之到來。丙、日本之政權操於廣田，蓋彼純粹為法西斯主義與軍閥結合，近衛不過傀儡而已。丁、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良好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戊、目前中國打仗，蘇聯當盡力幫助，若即時與日開戰，必使中國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2.蘇聯最近扣留日漁船三百艘，又將濱海省之居住(朝鮮)鮮人十五萬人，認為有可供敵之偵探者，於兩星期內遷入中亞細亞，此亦可以表明蘇聯向日挑釁之一種。日本雖提抗議，但蘇聯不理，彼亦不敢強硬，可知日本之力量已為中國消耗不少矣。3.誠然中國處此抗戰境遇，其困苦不堪言狀，但不經過此種環境，不能復興，望忍耐。4.蘇聯是中國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國願意供給軍火打日，亦要接受。總之予是黨人，所說的話完全要

辦到，亦不必要條約或合同，誓必定履行的。餘由張委員冲面呈。職楊杰、張冲謹呈。十一月十二日。」

先總統蔣公在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第八十七頁中曾說：「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可是蘇聯向日開戰，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此外，並在莫斯科洽購飛機(包括驅逐機、輕重轟炸機、超轟炸機)、坦克、高射砲、防毒面具等，並聘請若干飛行員、技術員、軍事顧問等。以後軍事委員會特設顧問事務處主持其事，派張冲擔任中將處長。

十一月十八日，張冲以在莫斯科任務告一段落，乃提前由俄返京，那時日軍正積極向南京攻擊前進。張冲曾在蘭州途次上電蔣委員長：

「即到南京。委員長蔣鈞鑒：職返國途中止在阿阻雪，恐遲滯，先將最要點電呈。本月蒸晚，職與伏氏宴別時，囑轉呈：(一)如吾抗戰到生死關頭時，俄當出兵，決不坐視；(二)飛機、重砲、汽油、坦克等當繼續儘量接濟維護，為減少軍輸困難及途中無謂損失計，擬按月連運飛機發動機及戰車主要機件到華就地裝配，計月可出飛機百至百五十，其他軍火亦多，如此可以長期抗戰，可否飭檢査南昌、杭州飛機工場及漢陽、鞏縣兵工場，將機器集中安全地帶，俄方當派技師多人來華裝造，餘俟面陳。雪止後即同王叔銘飛京。」

職張冲叩。

張冲抵京後，即向蔣委員長面呈在俄交涉經過詳情，在南京淪陷前數日，飛抵漢口。

張冲離俄後，楊杰不久即繼蔣廷黻為駐俄大使。一年餘後，又由邵力子接替。（楊杰在抗戰勝利後，參加李濟琛等組織的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於三十八年八月在香港被人刺殺）。

參加武漢國共密談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國軍退出南京。國民政府早已遷至重慶。武漢成為戰時實際上的首都。蔣委員長駐節武昌。在武漢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張冲常到武昌晉謁蔣委員長有所報告。

在國軍撤出南京，武漢成為臨時首都的時候，德國駐軍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底，蘇聯史達林、伏羅希洛夫元帥自莫斯科致電蔣委員長說明不能即刻對日出兵之理由及提供與德大使談判時應採取之態度：

「轉蔣委員長：卅電悉。（一）蘇聯政府之方針：假使蘇聯不因日方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是將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馬上改善。現在日本是侵略國，世界輿論因此就反對他，蘇聯如不因日方挑釁而對日出兵的時候，日本反要謂自己是侵略國之犧牲者，此將予中國與蘇聯以不利。（二）祇有在九國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許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就可以立刻出兵。因為在該時，世界輿論要認蘇聯行動是保護法律及正義之當然的行動，而日本在該時不能

自謂為被侵略之犧牲者，世界同情不歸日本。（三）蘇聯政府之上述態度，祇有蘇聯國最高蘇維埃才能將他改為立即出兵的態度，而最高蘇維埃會議最遲在月半或二月舉行。（四）在此一月半至二月中，我們決定用種種途徑及方法，極力的增加對中華民族及其國民政府之技術援助。

（一）關於委員長與德大使陶德曼談判，我們以為中國政府祇好採取下列態度：1. 中國向不願而不願打仗，然而他被攻擊，不得已來保護其民族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2. 攻擊者僅日本而已，雖然如此，日本如撤回其侵華中及華北之軍隊，並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時，中國為和平利益計，不拒絕與日本實行和平談判。3. 日本如果實行上述先提條件的時候，中國國民政府就允許談判兩國間一切問題。

（二）德國調停行動之估計如下：1. 德國願意救出現在的日本政府，並予他以休息機會；2. 現與日本締結任何停戰協定，日本必首先破壞，由此可知日本祇要敷衍時間，而德國從旁幫他；3. 中國政府之任務，是以偉大民族的政府之資格來講話，而不屈服於威脅。史達林、伏羅希洛夫。」

史達林的真意是不希望中國與日本談和而希望繼續抗戰，中日兩敗俱傷，以使中共成長壯大，奪取政權。

同時，國內所謂「低調俱樂部」的份子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及改組派首領汪精衛等正在暗中積極進行所謂「和平運動」。高宗武不斷與日方經常保持聯絡。梅思平則以中宣部（部長周佛海）特派員名義駐港，與各方聯繫。

德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最後並未成功，中國政府繼續抗戰。以後却有少數動搖份子脫離抗戰陣營，幻想與日謀和。結果不過是賣身投靠，演出一場醜劇而已。

民國二十七年底，汪精衛自重慶潛飛河內，發表「豔電」主和，以至南京「組府」，出任「主席」，與當年北伐時在武漢的風姿，相去不啻十萬八千里。而南京偽府的要角陳公博、周佛海，則是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二位代表中的二人。民國二十七年春，農曆年後不久，國共兩黨曾在漢口太平洋飯店張冲住處，秘密舉行一次會談。

國民黨方面代表為：陳立夫、張冲、劉健羣、康澤（兆民）、鄭介民五人。

中共方面代表為：周恩來、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葉劍英四人。

張冲派我擔任秘書工作。會談前數日，發出一份茶敘的通知，由我分別親送各代表住處。現在我還記得那時陳立夫住在璇宮飯店，劉健羣住在舊日本租界河街大本營第六部宿舍，康澤住在蘭陵街，鄭介民因常到飯店來，通知由我面交。中共代表通知，則送往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收轉。茶敘通知是由張冲具名的。由此可見，此次國共兩黨秘密會談是由張冲召集的，事前一定是經由蔣委員長的核准。所謂茶敘，不過是一種名義上的掩飾而已。

某日晚餐以後，兩黨代表先後到達，鎖上房門，開始會談，直到深夜一時餘始散。散會後，各人的表情都非常凝重，似乎沒有結論。這亦是

不會有結論的。永遠不會有結論的。此次國共兩黨秘密會談內容，事後我未看到張冲有書面報告，現在在總統府機要檔案中亦未發現。

國共兩黨代表自在漢口舉行過一次秘密會談以後，直到三十年八月張冲在重慶病逝為止，就再沒有舉行過第二次，此後均是由張冲單獨與周恩來等直接談判。

參加此次國共兩黨代表秘密會談的國民黨代表，除陳立夫、張冲二人外，其餘劉健羣、康澤、鄭介民三人均代表軍方，三人均曾先後擔任力行社書記。

力行社是軍方的秘密組織，不久即在漢口與「復興大同盟」同時解散。康澤當時任別動總隊總指揮，鄭介民時任軍統局戴雨農的副手。劉健羣不久突然離開漢口，跑到滇西雞足山出家，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但不久復出，在臺曾任立法院院長及立法委員多年。

張冲最初是陳立夫的部屬。戰前陳立夫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張冲任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設計委員等職，後來擔任陳立夫辦理對俄外交及對共談判的副手，最後受蔣委員長長的直接指揮。

以籍貫言，陳、張均係浙江人，康、劉、鄭分別爲四川、貴州、廣東人。

中共出席會談的代表爲四人。

周恩來，博古（秦邦憲）均爲江蘇人。

周恩來，係留法勤工儉學生，在巴黎參加共黨。返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要職，曾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軍權在握。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鬥爭勝利，由毛取周而代之，周則貶爲副主席（此

外尚有朱德、張國燾二人擔任副主席），素有不倒翁之稱。蓋周性格比較溫和務實，不太喜歡鬥爭樹敵，擅長辦理外交，進行「統戰」。毛澤東則在幕後進行陰謀與「陽謀」。偽政權在大陸成立之後，周出任國務院總理，已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日以癌症病逝北平。晚年在「四人幫」的壓迫之下，處境至爲艱困。

博古（秦邦憲），很像個中學教員。煙癮很大。留學莫斯科時，參加國際派，爲著名的所謂「二十八個布爾雪維克」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書記，遵義會議後垮臺，由國際派的張聞天繼任。秦仍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三十五年四月八日，與中共要員葉挺、王若飛、鄧發等由重慶乘飛機往延安途中，失事而死。

王明（陳紹禹），安徽人。爲中國國際派的首領。曾任中共中央書記。共產國際中共代表。

唯史達林之命是從。二十七年春出任中共中央江局書記，博古（秦邦憲）、周恩來則分任組織、軍事部長。武漢撤退後，長江局取消，改爲中原局，由劉少奇擔任書記。王明回延安後，終被毛澤東鬥爭放逐，流亡莫斯科，客死異國。王明年少氣盛，志大才疏，以爲有了史達林作靠山，就目空一切，但怎麼鬥得過毛澤東這個陰謀大家。

葉劍英，廣東人。當時擔任八路軍參謀長。

曾參加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大陸淪陷後，毛澤東封他爲「十大元帥」之一，並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文化大革命」時，他連他的愛婿名鋼琴家都無能力保護，而被紅衛兵小將們砍斷了手指。毛澤東死後，他

乃聯絡華國鋒、鄧小平等整肅四人幫。華國鋒被鬥垮後，鄧小平起而代之。葉因年老爲改革派壓迫辭去所有職務，終在前幾年病故。但是他的兒子葉選平却出任僑廣東省長。（最近傳聞升任僑務院國務委員，相當副總理職位。）女兒亦擔任主要的職務。這些人都是中共的「紅色封建貴族」。

出席漢口國共兩黨秘密會談的九位代表，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先生之外，其餘八人都已先後去世。陳立夫先生現在亦是八十餘歲的國之大老了。

二十七年四月四日，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

張國燾乘赴中部縣參加祭黃帝陵之便，隨主祭者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前往西安，轉往漢口，脫離了中共。這在當時是震動全國的重大新聞。張國燾係北京大學畢業生，與陳獨秀、李大劍等創立中國共產黨，迭任黨中要職，後來在西竄途中，與毛澤東等在懋功相會。他倆對於今後的計劃，發生嚴重的歧見，最後毛澤東竟秘密率領一、三軍團北進，結果形成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和張國燾領導的臨時中共中央的對立。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向西前進，最後在河西走廊爲馬家騎兵殲滅殆盡，僅剩極少數的殘兵逃往新疆。張國燾在實力喪失以後逃到陝北，備受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鬥爭，再加上王明（陳紹禹）由莫斯科回來，堅決主張要肅清黨內的托派份子，暗示張有托派的嫌疑。張在種種的威脅，不斷的鬥爭之下，「虎落平陽被犬欺」，祇有脫黨的一途了。

凡是反對中共中央，亦就是反對毛澤東的都

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其實中國那有什麼「托派」？不過是「反共派」、「反毛派」而已。

史達林爲了完成他個人的獨裁，不斷整肅異己，殺害功臣。托洛斯基在國內被鬥垮以後，流亡國外，仍免不了被追殺的命運。

史達林不但整肅蘇俄國內的托派，並且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指示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竟向蔣委員長提出所謂「托派問題」並指證「托派」份子為「日本參謀本部的代表」。真是欲加之罪。史達林爲什麼如此注意關切中國的「托派」？當然是爲了保護並鞏固中共的基礎，亦等於間接的鞏固了史達林的獨裁政權。

張國燾脫離中共以後，在漢口發表了一篇文章。接着被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開除黨籍。張國燾最後竟凍死在加拿大的老人院中。而陳獨秀在戰時病逝於四川江津，竟無以爲葬。亦云慘矣。在漢口，張冲與張國燾從未見面。

四月中，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來到了漢口。張冲本來和潘約定日期與潘午餐敘談。臨時因爲蔣委員長電召有要事垂詢，乃要我陪潘午餐。

那天，潘新理了髮，頭上搽了髮油，臉部現出幾粒麻點。午餐時，我倆默默的進餐，說些不着邊際的話，打發時間。一直等到張冲回來，他倆才到另一房間去談話了。

潘漢年在三十年代，是上海創造社的「小伙計」，曾主張「流氓無產階級專政」。爲中共五人特務小組之一員。中共五人特務小組負責人爲周恩來。其餘四人爲：趙容（康生）、潘漢年、

廖程雲（陳雲）、鄭惠安。

潘漢年後來負責香港及上海淪陷區的工作。

關於潘漢年與敵偽勾結的情形，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呈復蔣委員長：

「潘漢年前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軍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上海活動。據江蘇調統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據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來寧洽談一次，內容汪逆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透出消息，謂偽方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前奸偽青年團中央書記，現爲偽方工作）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等情。」

又浙江省政府曾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電呈蔣委員長報告潘漢年謀於盟軍登陸時，佔領上海：

「渝委員長蔣。五七七一密。特件。據十專署電稱：奸偽滬政治分局長潘漢年，藉蘇領館積極活動，謀於盟軍登陸時，佔領上海。謹聞。浙江省政府。辰馬聯印。」

中共表面上主張堅決抗日，實際上竟與日偽妥協。甚至與敵偽勾結，企圖從中取利，擴大勢力，破壞政府的抗戰。前軍統局上海區某區長，曾在蘇州爲江蘇省政府主席李士羣的家中，見到過潘漢年。這當中當然存在着許多的秘密。李士羣後來曾親赴江北揚州，與中共要員洽談。此一中共要員，可能是劉少奇。因爲其時劉正任中共原局書記。

李士羣原爲留俄學生。返國後參加中共地下

工作，後爲中統追捕，投誠後即爲中統工作。抗戰初期因違紀將受嚴重懲處，乃逃港轉滬，投靠日本特務首領土肥原。自汪精衛離滬抵滬，李士羣又爲汪主持特務工作。最後出任偽特工部長、偽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偽江蘇省長等要職。至是又與中共潘漢年等勾結，陰謀在抗戰勝利時，奪取東南富庶之區。但是紙包不住火，此一秘密終爲周佛海（周此時已與軍統取得聯繫）所悉，乃令其部下羅君強（曾任僑務司司法行政部長、偽安徽省長等職）、熊劍東（偽財政部稅警團副團長）通知日本憲兵，由上海虹口日本憲兵隊長出面請李士羣吃晚飯，在食物中放入細菌，將其毒斃。

當時偽江蘇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袁殊，兼任上海新中國報社長，此人是一多重的間諜，且根本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是留日學生，返國後曾在上海發行「文藝新聞」小報，爲中共作宣傳，同時，他又擔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諜報員。戰前因「西洋怪人間諜案」在漢口被捕，投誠後爲中統工作。戰後至滬，爲偽特工所捕，又向李士羣投誠，爲李之重要幹部。同時，他又爲日本人搞什麼「興亞建國運動」，準備組織新的政黨，後來由於周佛海的堅決反對，乃告取消。交換條件是袁殊補爲偽中央委員，並由周佛海出資三萬元辦新中國報，由袁殊出任社長。新中國報從此成爲中共在上海活動的據點。該報曾刊載日皇的照片，說明是「天皇陛下玉照」，以取得日人的歡心，實際上却是中共的地下組織。由此可見中共是爲了目的，不擇任何手段的，揮霍羣、劉慕清、翁永清等，都是該報的重要幹部，亦是中

共的重要幹部。惲逸羣在上海淪陷後曾任華東大行政區的「宣傳部長」兼「解放日報」社長。

抗戰勝利後，袁殊並未被捕。大陸淪陷後，傳說他擔任「中共外交部」日本問題研究員。

大陸淪陷後，毛澤東為解除陳毅三野的兵權，命陳「專攻」「專任」上海市長，潘漢年出任副市長。四十四年初，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四月初，赴北平出席中共七屆五中全會，在會議期間，以「內奸」問題被秘密逮捕審查。罪名為叛徒、內奸、特務、反革命份子，預審期長達八年。另一罪名為三十一年十一月淮南之行之「鎮江事件」，指潘漢年當年帶領武裝偽軍至新四軍地帶清鄉，以致死傷不少新四軍戰士，為此「鎮江事件」立為重點專案。五十二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潘漢年以「內奸」罪（罪名計有：在抗日戰爭中投靠國民黨、投靠日本特務機關、「解放」後掩護大批反革命份子，並向臺灣提供情報，引起上海「二·一六轟炸」）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五十五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後，永遠開除黨籍，改判無期徒刑。六十四年五月，與其妻董慧（潘漢年第二任妻子。廣東人，香港道亨銀行老闆之女）下放湖南茶場勞改。六十六年四月病逝長沙。終年七十二歲。潘漢年自以「內奸」罪名被囚至病逝，前後長達二十二年之久。直到七十一年中共始為潘漢年「平反」，恢復「名譽」。這就是「統戰功臣」的下場！所謂「統戰功臣」，亦就是「內奸」、「反革命份子」、「叛徒」。這亦就是中共的「辯證法」。

又其堂兄潘梓年，抗戰時曾任重慶新華日報社長，戰前擔任中共文化領導幹部。五十七年以「反革命極左五·一六兵團首惡份子」被捕，六十四年四月，病死獄中，終年八十歲。

潘氏兄弟二人，終生效忠中共，結果均被折磨而死，真是所為何來？

為了訓練流亡青年，培養鄉村幹部人員，軍委會第六部與湖北省政府聯合開辦湖北鄉村幹部訓練班，嚴立三（湖北省政府代理主席，主席為陳誠）兼班主任，方希孔（治）（軍委會第六部）為副主任，聘張沖為訓練處長，故湖北籍立法委員錢雲階為副處長。筆者擔任第二大隊副主任訓練員。我每天下午渡江到武昌，在某中學教室舉行小組會議。該班結束後，部份學員分發到湖北各縣從事基層工作。

為了促進中蘇文化交流，從事國民外交工作，孫科、陳立夫與張沖等人，於二十五年春在南京創立中蘇文化協會，南京淪陷後，遷到武漢。由孫科擔任會長，陳立夫為副會長，張沖等為理事。在武漢時，中蘇文化協會決定開辦俄文專修學校。推張沖為校長。張沖聘卜道明為教務長，派筆者為該校秘書。武漢撤退前，該校遷至桂林。以後再遷重慶。復於貴陽，昆明設立分校。各地學習俄文青年，極為踴躍，亦是當時流行的風氣。蓋當時俄國飛行員正駕着俄製飛機，常在武漢等地天空與敵機拼鬥追殺。

張沖在武漢戰事緊急時，曾於七月八日函致疏散到湖南沅陵的張夫人余文（柳）女士。這封信充滿了忠孝之情，仇讎之愛，亦充份表露了對

國家與領袖愛戴的血忱。

茲將原函錄次：

「柳：接雪正兄函，知你病腰，並知已延醫診治，稍為痊可，甚慰甚慰。雪正兄謂你希望我回沅陵一行，我亦盼望速來視你，因為戰事太急了，而且我係委座左右不可缺少之一人，看他晝夜勤勞，為國辛苦，實在不好意思向渠請假。你是明理之人，當了解忠孝之道。請暫時壓制兒女之情，待局勢轉好之後，我同你歸隱，不問世事都可以。此時漢口掃蕩次第退出，難民也退出。晚上商店很早就閉門，不像從前熱鬧。自家用人，一個禮拜找不到，衣服無人洗。前日始找到一位五十四歲老太婆，吾與桐蓀等衣服始有人洗。樓下老太太還住在此地。天天念經，常常問你。」

「委員長昨送了三千元給我零用，我已奉還。國家財政如此困難，省一分好一分。我已滙一百元給你父母，四百元給我老母，勿念。炎（註：張沖長子）信來，謂我母病右手，人亦難看了，真使我念念。種（註：次子）兒在彼健康否？叫他聽大人的話為第一。此兒聰明，往往自作主張，不肯下人，不易教育。對人要客氣。盧太太及房東鄔夫人、同鄉林太太，都要多多往來，好好的招呼。我現在一個禮拜，三天早晨在委員長前面承訓，很忙迫。一切自知保重身體，請你放心。」

夫張 冲字 七月八日夜十二時

武漢是在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淪陷的。張沖在淪陷前數日才離開武漢赴湘，轉往重慶。

（未完待續）